

三联 • 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人类的四分之一：
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
(1700-2000)

李中清 王 丰著

陈 卫 姚 远译 史建云校订



生活 · 读书 ·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美)
李中清,王丰著;陈卫,姚远译. -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0.3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7-108-01374-6

I. 人… II. ①李…②王…③陈…④姚… III. 人口-
研究-中国 IV. C9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3982 号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875

字 数 212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16.50 元

本丛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
面向海内外学界，
专诚征集中国中青年学人的
优秀学术专著(含海外留学生)。

•

本丛书意在推动中华人文科学与
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
奖掖新进人材，鼓励刻苦治学，
倡导基础扎实而又适合国情的
学术创新精神，
以弘扬光大我民族知识传统，
迎接中华文明新的腾飞。

•

本丛书由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负担出版资金，
保障作者版权权益。

•

本丛书邀请国内资深教授和研究员
在北京组成丛书学术委员会，
并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
按年度评审遴选，
决出每辑书目，保证学术品质，
力求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与评奖制度。

致 谢

我们最初决定写这本书是在 1995 年,但是直到 1996 年 1 月份才动笔。我们是在三个不同城市,分四个阶段来写作的:1996 年上半年,在帕莎迪那(Pasadena)构思并开始着笔;到 1997 年上半年,在尔湾(Irvine)完成了大部分章节的草稿;1997 年夏季,在北京完成了全书初稿;1998 年上半年在帕莎迪那与康文林(Cameron Campbell)一起将这本书最终定稿。

本书大量借鉴了我们与康文林及其他人合作的出版物,以及许多学者的独立研究成果,在出书及翻译过程中,还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特别帮助,在此我们要向所有这些朋友和机构衷心致谢。

首先最应感谢的是康文林,我们的合作者、同事和亲密的朋友。他与我们交往已久,在本书的写作和其他研究中,我们得到了他的许多帮助,在此对他的诸多贡献及友谊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

第二,我们要感谢许许多多写作中帮助过我们的朋友:蔡泳帮助我们制作了地图;Tommy Bengtsson、郭志刚、Andy Hinde、郝虹生、Jan Oldervoll、Roger Schofield、Gunnar Thorvaldsen、Hanne Willert 和解振明为我们及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而顾宝昌、Tamara Hareven 和吴承明在文献目录方面给

予了帮助; Mark Elliott、Hill Gates、Ramon Myers、William Rowe、Charles Tilly、Susan Watkins 和 Arthur Wolf 通读整本书的草稿后, 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同时 George Alter、Tommy Bengtsson、Mark Elvin、Charlotte Furth、Francois Godement、Susan Greenhalgh、Morgan Kousser、William Lavelly、李伯重、John McNeill、Kenneth Pomeranz、David Reher、Roger Schofield、John Shepherd、Dorothy Solinger、Judith Treas、Noriko Tsuya、R. Bin Wong、E. A. Wrigley 和赵中维也在有关章节内容和写作上提出了多方面的, 有时是非常广泛的意见。尤其要感谢的是李伯重博士。他帮助我们对一篇会议论文做出修改, 使其成为本书的第三章。

第三, 我们要感谢在这期间为我们提供支持的五个学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它们是: 加州理工学院, 尔湾加利福尼亚大学分校,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 东西方中心和夏威夷大学。

本书的翻译工作, 除了两位译者之外, 还特别得到了郭志刚博士和李伯重博士的大力帮助, 并由史建云先生对译文进行了全面校订, 三联书店的许医农先生为此书中文译本的出版做了十分认真的编辑工作, 在此我们深表感谢。

最后, 我们还要感谢自始至终给予我们支持的家人和朋友, 但对我们的孩子善玄、善时和凌轩, 应该说, 仅仅感谢是不够的。

李中清 王 丰

1999 年 9 月

在食物的需求满足之后,我们最强烈和普遍的愿望便是两性间的情欲。在这种人类情爱所带来的欢乐中,很少是无意识的。被友谊所升华的有道德的情爱,似乎是肉体和精神快乐的结合,尤其符合人类的本性,能最大程度地唤醒灵魂的同情心,并取得最大的快乐。无论一个人精神快乐有多大,一旦经历了这种道德的情爱的真正快乐之后,他都无法不怀念那段一生中难忘的时光,他的想像愿意在此停留,他带着最温柔的思虑回味和沉醉于此,并多么希望再次经历。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目 录

第一部分 神话

第 1 章 引言	3
第 2 章 马尔萨斯的神话	20

第二部分 现实

第 3 章 生存	39
第 4 章 死亡	64
第 5 章 婚姻	94
第 6 章 生育	121

第三部分 体系

第 7 章 体系	153
第 8 章 社会	179
第 9 章 人口学, 意识形态和政治	202

附录 中国人口资料(1700—2000)	215
----------------------------	-----

中文参考文献	228
--------------	-----

外文参考文献	234
--------------	-----

索引	277
----------	-----

出版后记	296
------------	-----

图目录

- 1.1 中国人口和世界人口, 0—2000
- 3.1 中国的人口膨胀, 1700—2050
- 3.2 中国人均粮食产量, 1930—1986
- 3.3 中国男性平均身高, 1900—1985
- 4.1 北京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 0—4 岁, 1700—1830
- 4.2 四国的女婴与男婴死亡率之比(${}_1q_0$), 1700—1840
- 4.3 四国的女童与男童死亡率之比(${}_4q_1$), 1700—1840
- 4.4 北京女性的围产期、新生儿和婴儿死亡率, 1700—1830
- 4.5 中国女性之偏高死亡率, 1936—1984
- 4.6 辽宁省不同家庭关系曾生子女的性别比, 1792—1840
- 5.1 一些国家的女性分年龄未婚比例, 1800 年左右
- 5.2 一些国家的男性分年龄未婚比例, 1800 年左右
- 5.3 中国 1900—1925 年出生队列的男性和女性婚龄模式
- 5.4 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男性生育率的年龄模式, 清朝皇室家族, 1700—1874
- 5.5 中国入赘婚姻, 依妻子年龄, 1991
- 6.1 东亚和欧洲“自然”年龄别已婚生育率, 1600—1800
- 6.2 中国和欧洲分年龄不育妇女的比例, 1730—1900
- 6.3 上海与全国生育率, 1950—1982
- 6.4 中国 30—34 岁妇女避孕或怀孕头 3 个月进行流产的比例, 1960—1987
- 6.5 中国农村分时期胎次递进比, 1979—1991
- 7.1 被束缚的人口增长, 内在性抑制
- 7.2 清皇族中的收养和人口行为, 1700—1850

- 7.3 被束缚的人口增长,外在性压力
- 7.4 中国和西方的人口转变
- 7.5 人口增长和中国的人口体系,18 世纪到 20 世纪初
- 7.6 中国的人口增长和生育率,1950—1987
- 9.1 部分国家离婚率,1950—1990
- 9.2 部分国家非婚生育率,1900—1990
- 9.3 中国部分省份的离婚率,1955—1992

地图目录

- 7.1 中国分地区的人口增长率,1776—1990

表目录

- 4.1 中国男性不同时期地点特定年龄段预期寿命
- 4.2 中国女性不同时期地点特定年龄段预期寿命
- 4.3 分年龄死亡率的下降,1929—1931 和 1973—1975
- 4.4 分胎次和终身生育子女数的性别比
- 5.1 中国不同时期和地区女性平均初婚年龄
- 5.2 中国不同时期和地区女性 30 岁时的未婚比例
- 5.3 中国不同时期和地区男性未婚比例
- 5.4 中国不同时期和地区男性平均初婚年龄
- 5.5 中国不同时期和地区的再婚率
- 6.1 中国不同时期和地区的已婚生育率
- 7.1 中国不同时期和地区的收养率
- 7.2 辽宁农村谷价、死亡率和出生率的相关性,1774—1873

第 1 章

引 言

人类的早期迁移和定居及其动因的历史,以一种惊人的方式说明了人类增长超过生存资料的永恒趋势。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Malthus, 1826/1986, 61)*

马尔萨斯的遗产

在过去的 300 年里,世界人口增长了 10 倍。1700 年的世界人口尚不足 7 亿,而今天,21 世纪的前夕,世界人口超过了 60 亿。世界人口的这种急剧增长缘于 18 世纪后期开始的人口死亡率的逐渐下降和生育率的上升。其结果,世界人口倍增至 1850 年的 12.5 亿,1950 年的 25 亿和 1985 年的 50 亿。尽管在最近几十年里,由于生育率迅速下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出现下降,但是预计世界人口将在 2200 年实现稳定之前再

* 本书引文出处系采取国际流行规范:即在引文或作者姓名之后的括号中标记所引用作品的版本和页码,有关作品的详细信息则列在书后的参考文献中。如此处的“(1826/1986, 61)”,表示括号前的一段引文系引自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826 年版、1986 年重版的第 61 页。——校注

翻一番,而达到 110—120 亿。^[1]

自从 18 世纪以来,人口问题便成为社会理论的焦点之一。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亚当·斯密(Smith)、李嘉图(Ricardo)和马尔萨斯——都密切关注着人口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他们的经典著作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关于人口变化过程与后果的认识。即使是在 20 世纪后期现代经济增长转变的条件下,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会限制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担忧仍然存在。对经济的担忧更进一步扩展到对生态的忧虑。^[2]虽然我们现在相信经济的制约是越来越有弹性的,但我们也认为环境的制约是越来越没有弹性的。^[3]

马尔萨斯的遗产深深影响了我们对控制人口增长的认识。在其有关人口的著名论著里,^[4]马尔萨斯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抑制:一种存在于现代西方世界,即通过限制婚姻来控制人口增长,马尔萨斯称之为预防性抑制;另一种存在于非现代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即人口无节制地增长,直到不断增长的贫困导致死亡率上升,马尔萨斯称之为现实性抑制。对于马尔萨斯而言,计划生育要求具备一种独特的现代西方式的能力,能够有意识地计量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决定是推迟还是取消结婚。虽然避孕与流产技术的出现使得我们能够控制生育率,取代先前的预防性抑制,但是我们对前现代世界人口机制的认识从根本上说仍然是马尔萨斯的。

然而,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根本改变了人口变化过程的性质。在世界范围内,由于现代医疗和公共卫生的发明与传播,生育率和死亡率在近几十年里出现了下降。这种由死亡率率先下降并随之引起人口增长,最终由生育率下降而控制人口增长的过程被称为“人口转变”。很少有人口行为的变化,能像近几个世纪

预期寿命的上升和本世纪生育率的下降那样对个人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很少有人口过程,能像人口爆炸那样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这种技术传播(如果不是技术革新)的速度显然与文化构建和社会形态有本质的联系。对于生殖技术来说尤其是如此。人们通常认为计划生育是与我们有意识地计量生育孩子的成本与收益、从而决定控制生育的能力的增长相联系的。同样地,医疗技术的发展与传播要求有一种控制人类自身和自然界的新观念。更重要的是,这种意识的增长也被认为与个人决策的扩散有关,而这种个人决策又与小家庭的增多、识字率的提高、西方个人主义的滋生和蔓延以及市场经济的日益渗透有关。约翰·哈伊纳尔(John Hajnal, 1965, 1982)和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 1978, 1986, 1987)等学者曾经指出,欧洲人口转变的起源、欧洲个人主义的根源、甚至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都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并根植于欧洲的家庭与人口文化之中,而这种文化促进了这些革命性的社会经济变化。他们和其他当代社会理论家们比马尔萨斯本人更明确、更系统地将人口体系与社会、经济和文化体系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马尔萨斯理论的水平,光大了马尔萨斯学说的理论意义。

在这样一种观念下,非西方的父权制、社会形态和经济过程,都被归入一个世界性的二元对立体系中本质上反现代的“另类”。中国尤其被当作是这种“另一面”的典型例子——部分是由于它的规模,部分是由于它有记录较完整的历史。马尔萨斯(1803)特别指出:中国是一个现实性抑制占主导地位而实际上毫无预防性抑制的社会的最好例子。^[5]与此相类,哈伊纳尔(Hajnal, 1982)和斯科菲尔德(Schofield, 1989)认为,如果西方

的家庭体系在社会体系中处于一端的话,那么中国以及印度则处于另一端。[6]

这种合并和混淆,至少部分是由于对中国社会和人口缺乏实际的了解。就在 20 年前,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几位人口学家,也几乎没有可使用的数据。中国同时成为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人口最多而又鲜为人知的国家。[7]其结果,当西方人口史的研究证实了马尔萨斯对西方(尤其是对英国)人口行为的观察结果时,[8]由于缺少类似的对中国人口史的研究,使得马尔萨斯的二元对立论更有立足之地了。[9]18 世纪欧洲旅行家们的表面观察,也因而成了那一辉煌时代的真实;马尔萨斯的假说便成为公认的真理。

然而,所有这些正在发生变化。近来的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揭示了 20 世纪的中国人口史。[10]同样,新的数据和方法也开始揭示出 18 和 19 世纪的人口史。[11]初步的研究已经重新构建了中国自 1950 年以来存活的近 17 亿人口以及生活于 18、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 30 亿人口中 50 万人口的历史。[12]虽然这些新近的中国人口研究只是刚刚开始揭示中国人口行为的地区差异,但与西方和马尔萨斯人口行为的广泛差异已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历史和现今人口的重要性。中国是世界上土地面积第三位而人口最多的国家。[13]目前,中国的人口接近 13 亿,占世界人口的 1/5,而在过去这一比例更大。[14]图 1.1 展示了过去两千年的中国和世界人口,这也几乎是全部有人口数据记录的人类历史。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中,每三到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本书概括了我们目前对中国人口的认识,构建了一个中国人口行为体系模型,这个模型不同于由马尔萨斯首次提出,又经过别的学者根据欧洲(尤其是英国)人口行为加以改进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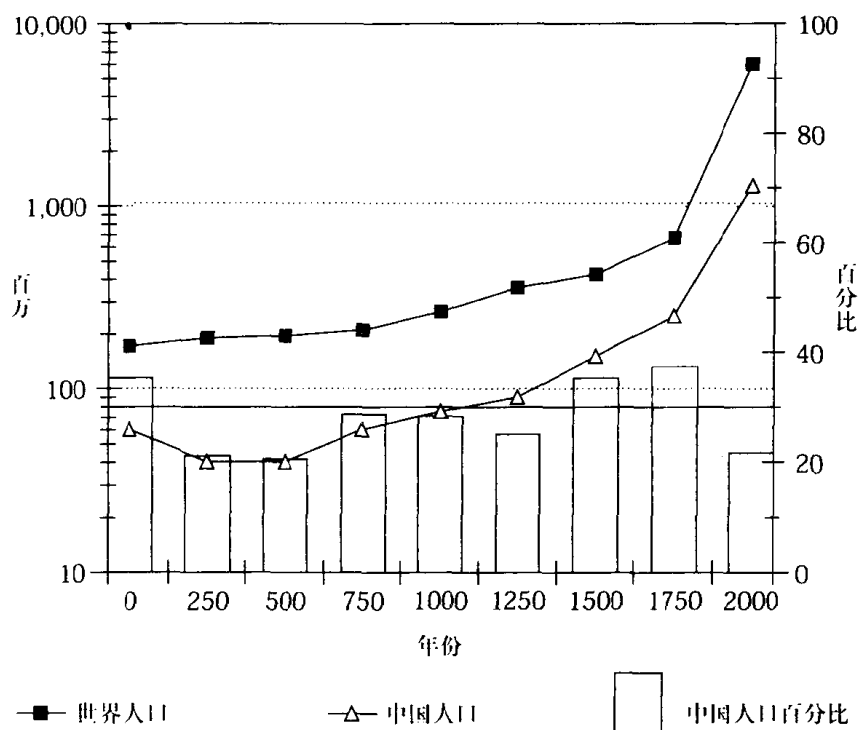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人口和世界人口, 0-2000

模型。通过修正目前对过去三百年的中国社会与经济的认识, 中国人口行为不仅为马尔萨斯的预防性和现实性抑制模型提供了一个可以替代的模型; 它也揭示出东西方之间的人口行为存在很多差异, 而这些差异是社会组织的地区和历史差异, 并非不同的人口抑制的结果。[15]

中国的现实

中国的人口体系

留存至今的中国历史人口行为的四种独特的现象, 向马尔

萨斯对比较人口行为(尤其是对中国)的认识提出了质疑。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称之为中国人口体系的特征。^[16]

死亡是第一个这样的遗产。马尔萨斯认为“对中国人口来说,饥荒是所有现实性抑制中最有力和最频繁的”(1826/1986, 109),但是新近的历史研究表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溺弃女婴的作用可能更大(Lavelly and R. Bin Wong, 1998)。^[17]在许多地区,中国家庭通过溺弃女婴来控制其孩子的数量与性别。根据记载,在某些年份里被溺女婴占出生女婴的比例高达40%,^[18]甚至有时男婴也难以幸免。相反,在西方社会,溺婴是少有所闻的——至少从17世纪以来是如此。^[19]虽然中国溺婴现象在20世纪初期已大幅度减少,但是性别比继续偏向于男性,这意味着溺婴和弃婴的行为仍然存在,虽然在程度上要比过去轻得多。其结果,女童存活到成年的平均数与西方相比显得尤其低(James Lee and Cameron Campbell, 1997, 62, 67)。

这种较高的女婴和女童死亡率产生了中国人口体系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婚姻市场的性别失衡。女性普遍都结婚且结婚较早,而男性往往结婚较晚,甚至根本不结婚。一夫多妻制和反对妇女再婚的习惯,使得可婚女性的短缺状况进一步恶化。在西方,男女两性的婚姻都受到限制,而在中国,至少对于女性而言结婚是普遍的。^[20]例如,在19世纪的西欧,15岁至50岁在婚女性的比例低于60%(Coale and Treadway, 1986),而中国相同年龄的妇女90%都结婚了。即使在20世纪,婚姻在欧洲变得越来越普遍,至少还有5%到10%的女性到了45岁仍然未婚。而在中国相应的未婚比例几乎等于零。^[21]

然而,由于中国人口体系的第三个显著特征——已婚生育率低,持续的高结婚率并没有促使中国的生育率上升。^[22]西方

已婚妇女在没有避孕条件下的总和已婚生育率(TMFR*)——已婚妇女如果按某一年的分年龄生育率度过一生的话所要生育的孩子数——可达平均 8 到 9 个孩子。〔23〕而在中国,已婚妇女的 TMFR 为 6 或者更低。已婚生育率低是中国人口体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与马尔萨斯及其同时代的学者认为中国生育率相当高的观点相反,中国人口的总体生育率可能不比欧洲的生育率高多少,而其已婚生育率则要比欧洲低很多。〔24〕

当生育率开始下降时,中国生育率下降比西方晚但比西方更快。迟至 1970 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FR**)——任何妇女如果按某一年的分年龄生育率度过一生的话所要生育的孩子数——还几乎为 6,但到 1995 年时,中国的 TFR 就降到了 2。尽管生育率在中国和西方都已降到了甚至低于更替水平——每对夫妇 2.1 个孩子——但是中国生育率的这一下降过程只花了不到 1/4 世纪的时间,而西方则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25〕换言之,中国已婚生育率不仅比西方低得多,而且下降速度也快得多。

最后,尽管中国人有强烈的血缘观念,并且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依赖于家庭和亲属,但由于低生育率和低存活率,中国的父母亲不得不经常用非真实的亲属关系来代替其生物繁殖力。〔26〕在近代早期的西方,收养关系几乎不存在,现在西方每百名至千名儿童中也仅有一名是被人收养的(古迪 Goody, 1983),而在中国,每十至百名儿童中就有一名是由非亲生父母抚养成人。与西方人收养婴幼儿不同,在中国许多被收养的孩子是青少年,有些甚至是成年人。在中国,这些年龄较大的被收养者几乎都是男

* TMFR——Total Marital Fertility Rate, 总和已婚生育率。

** TFR——Total Fertility Rate, 总和生育率。

性,被收养为儿子和女婿。相比较而言,大多数年龄较小的被收养者是女性,收养为女儿和儿媳。(Wolf and Huang, 1980)。

换言之,中国人口体系以多重选择性为特征。这平衡了浪漫爱情和包办婚姻,平衡了婚姻激情与婚姻限制,平衡了父母的关爱与溺弃决定,以及对其他孩子的收养。与马尔萨斯的模式相反的是,在中国,人为的作用不仅限于婚姻,而且主要是在集体的水平上而非个人的水平上起作用。中国的个人总是根据集体环境调整他们的人口行为,以使集体功效最大化。中国人口行为的明显特征,是中国历史遗产中两个特别突出的特点——父系祖先崇拜和官僚国家专制的结果。

中国的人口转变

以上这些显著的人口特征以及历史传统,导致了中国与西方迥然不同的人口转变过程。在西方,人口转变过程是不连续的,而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则是连续的。而且,西方人口转变的发生,主要是个人力量在从婚姻到生育和死亡的行为延伸的结果;而中国的人口转变,则是从家庭到国家的集体决策过程扩张的结果。[27]

西方生育率下降的主要过程是从推迟结婚到控制婚内生育的转变。[28]对西方人来说,婚内生育控制是相当新的观念,要求大胆采用新的技术和新的思想。技术革新带来了很多新的避孕方法。同时,文化传播使得“计划生育是需要的和可行的”的观念得到普及。如今人们可以早结婚,而在婚后限制生育。

通过比较可知,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几种人口行为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些行为变化源自于计划人口的悠久传统。对中国人来说,计划人口一直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控